DOI:10.20069/j.cnki.DJKX.2026038

金融发展与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视角的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书洋[1,2],王晨宇[1],吴 珂[2]

1.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1130
2.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北京 100038

移动端阅读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出发,批判吸收西方金融发展理论中的功能分析方法,将马克思生息资本和资本循环与积累理论拓展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维度,利用中国2008—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金融不仅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促进技术创新等渠道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更能够通过绿色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等金融创新引导生产要素发生质变,优化再生产结构,从而实现生产力发展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金融发展对新质生产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绿色发展和公平发展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据此,提出优化金融支持创新多维机制、完善金融促进公平发展制度安排、构建协同金融供给体系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技术创新;绿色发展;公平发展;金融创新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6(04)-0001-13

一、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质变跃升,已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核心议题。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①。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因素,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其发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与可持续性具有重大意义。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重要支撑。然而,在新质生产力范式下,前沿技术"高风险、长周期"、绿色与数字领域"资产轻、回报慢"等特征,使金融支持创新面临适配性不足、资源分化和脱实向虚等新挑战。如何在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实现有效平衡,现有理论仍缺乏系统解释,金融在新质生产力体系中应如何发挥作用亟待深入研究。

在理论层面,技术创新始终被视为驱动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创新需要充足的资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24ZDA01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24M76270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24JHQ011)。

作者简介:文书洋,男,通信作者,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教授,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发展金融学、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电子邮箱为wensy@swufe.edu.cn;王晨宇,男,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学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绿色金融;吴珂,女,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数字经济。

① 参见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3072.htm。

本投入，而金融体系通过资本的跨时空配置，能够有效支持技术研发和应用[1-2]。在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演化进程中，从金融结构理论，再到金融深化理论，以及近年来对金融过度化问题的反思，金融发展理论系统分析了金融体系在资本配置、风险分散与创新支持中的功能。然而，随着金融化的加剧，过度的金融发展可能导致资本流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抑制经济增长[3-4]。这一矛盾也反映在当前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中，在新质生产力更高维度的发展要求下，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现实中的若干突出问题。在实践层面，当前创新活动呈现出融资需求快速扩张、投入结构显著变化和风险特征重塑等新趋势：前沿技术研发通常需要长期、持续的大规模资本投入，其现金流高度不稳定，项目成功率低，风险难以通过传统信贷评估模型识别；绿色技术和数字产业的投资以研发、人力、算法等无形资产为主，缺乏可抵押物，难以满足传统银行“抵押—担保”体系的要求；与此同时，新兴产业的商业化周期长，收益不确定性高，进一步加大了融资难度。这些现实特征共同导致创新领域的资本需求与传统金融供给体系之间出现结构性缺口。基于西方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金融发展路径频繁表现出脱实向虚趋势，使金融资源在实践中更多流向流动性强、短期回报高的领域，而非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需要长期资本支持的部门。因此，现有理论在解释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金融支持创新的现实障碍方面仍显不足，需要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审视金融资本的配置逻辑与创新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相比西方金融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分析金融与生产力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逻辑和辩证观点。一方面，生息资本依托信用机制得以扩张，其能够加速资本循环、缩短资本周转时间，从而推动资本积累与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使金融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生息资本的逐利性具有内在的自发扩张倾向，容易诱导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生产领域，流向获利更快的虚拟部门，引发资源错配、资本价格泡沫和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等深层矛盾。正是在“促进—制约”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中，马克思揭示了金融资本支持生产力提升的可能性，也揭示了其偏离实体经济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这种辩证分析为理解金融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然而，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主要形成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其讨论的金融形态相对简单，对于当下金融工具高度复杂、金融市场深度扩展以及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新兴议题迅速崛起等全新现象仍缺乏直接解释力，对于金融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关系仍存在理论空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吸收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和现代金融功能观的有益成分，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金融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新理论框架。

因此，为进一步探讨金融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金融发展对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作用机制。基于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资本积累与循环理论以及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提出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等推动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理论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08—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金融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边际贡献有三点。第一，在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方面实现拓展。相较现有文献大多聚焦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及指标体系构建[5-6]，本文将“金融发展”引入分析框架，强调其在资源配置、绿色转型和创新驱动等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为理解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在研究选题和问题意识上实现对现有研究的补充与延展。第二，现有研究多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考察数字金融等单一金融工具对新质生产力影响机制[7-8]。本文提出并验证“资本矛盾—金融创新—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性作用链条，将绿色金融等金融创新纳入统一政治经济学框架，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通过稳健性与多维度金融回归形成“理论—方法—实证”闭环，从而揭示金融在推动生产力由“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变中的制度基础。第三，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研究上实现拓展。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息资本、资本循环与危机等问题[9-10]，尚未关注新时代语境下“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的发展命题。本文在马克思生息资本与资本循环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实践，提出“金融作为质变催化器”新命题，即金融能够将资本逻辑内在矛盾转化为制度化规则，并通过金融创新工具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形态跃升。这一以“矛盾转化”为核心的分析范式不仅为理解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在新时代中国语境下的应用边界与时代内涵。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文献围绕新质生产力展开研究，主要聚焦其内涵界定和指标建构。相关理论研究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通过新要素引入与高效组合推动劳动者素质、生产资料和生产组织整体跃升，体现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5-6]。在新质生产力内涵理论基础上，部分学者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体系，主要围绕科技、绿色、数字等要素形成综合指标，并采用熵值法、投影寻踪等方法对省域或城市层面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以呈现其结构特征与空间差异[11-12]。

第二类文献关注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关系，主要探讨金融如何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既有文献仅有少数研究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关系以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数字经济崛起带动金融科技发展，通过金融科技应用提升金融体系现代化水平和效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资金保障[13]。在金融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实证研究中，现有文献多聚焦数字金融、科技金融等单一金融工具作用机制。相关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均能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分别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创新能力提升和创业活跃度增强等中介路径作用于新质生产力[7,14]。虽然这些研究揭示了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机制，但多停留在单一金融工具层面，对金融如何通过多维度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总体跃升的系统性分析仍较不足，理论深化与机制识别有待进一步拓展。

第三类文献是关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探讨金融体系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资本配置等促进经济增长，以及金融过度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熊彼特[15]认为金融机构通过提供资金推动新技术和新产业出现，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革命性影响。戈德史密斯[16]进一步指出金融市场规模与复杂度提升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长期增长。麦金农[17]从金融深化角度论证金融抑制如何阻碍资本有效配置，主张通过金融自由化改善资本使用效率。然而，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过度化问题。Arcand 等[3]指出，过度金融发展可能引起资源错配与风险积累，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文书洋等[4]的研究从利润视角进一步揭示金融过度化危害，指出金融行业利润过高会推升实体融资成本，并可能削弱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印证金融过度化对实体经济的潜在危害。

第四类文献基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探讨虚拟资本与生息资本特性及其对经济危机、金融化现象与生产力发展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息资本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通过利息获得增殖，虚拟资本则脱离实体生产实现价值增殖。基于此，Passarella[9]通过扩展再生产模型揭示虚拟资本扩张如何造成实体经济资金紧缩。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金融与生产力关系研究中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分析框架。Sweezy[18]指出，金融扩张一方面通过资本流向影响生产力增长，另一方面可能固化生产关系、抑制技术创新，从而造成经济长期停滞。此外，相关研究指出过度信用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趋势，资本集中会加剧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失衡，造成周期性危机[10]，这一结论与马克思信用理论相一致，揭示了虚拟化积累对实体经济的潜在破坏性。

可见，现有文献虽然深入探讨了金融与经济增长以及虚拟资本与金融化问题，但关于金融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视角下，学术界关于金融如何通过支持多维度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讨论较少。因此，本文旨在聚焦金融发展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通过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视角进行系统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为系统分析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基础视角，并在此框架下批判性吸收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功能观有效成分。马克思生息资本与资本循环理论揭示了

金融资本在促进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中的动因及内在矛盾，为理解金融支持生产力发展宏观逻辑提供了理论根基。西方金融理论则从资本跨期配置、风险分担、信息传递等微观机制出发，刻画金融体系具体运作方式。二者分别强调资本逻辑与制度功能，在解释现代金融体系与生产力演进关系方面具有互补性。

要理解金融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需要先回顾金融与经济发展理论脉络。早期货币理论奠定了金融资本理论基础。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货币促进分工与交换，李嘉图进一步探讨货币数量与经济运行的关系。但是，这些理论未能揭示金融资本对经济动态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未充分解释信用创造机制。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指出货币可转化为资本并实现自我增殖，生息资本通过利息分享剩余价值，但并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金融资本通过信用维持产业资本再生产，却可能占据过高利润份额，导致金融资本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进而引发经济不稳定和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揭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辩证运动规律，为分析当代金融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引。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在解释金融支持创新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熊彼特提出创新融资理论，强调金融体系通过支持创新主体推动“创造性毁灭”；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结构完善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默顿和博迪的金融功能观从微观层面系统概括金融核心功能，为理解金融如何通过资本跨期资源配置支持创新提供分析工具。然而，西方金融发展理论以资本增殖为逻辑起点，其在解释过度金融化等问题时，往往忽视金融嵌入社会生产关系的属性。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根基，同时批判吸收西方金融发展理论中有助于解释市场运行微观机制的技术性成分，系统构建符合新时代特征的理论体系，从而阐释现代金融体系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机制。

马克思指出，当金融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领域，其功能便由支持生产力发展转向追求自我增殖。近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路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过度金融化的负面影响。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传统技术进步与增长理论局限，强调在技术创新作用下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需要技术、资本与其他要素形成更高效动态整合。与传统技术进步理论侧重单维度量变不同，新质生产力以技术、要素和产业深度融合为核心，将绿色、公平等高质量发展维度纳入生产力质变跃升核心内涵。在这一视角下，金融与发展关系需重新界定：金融体系功能由“支持增长”转向“推动质变”，在技术革命中承担更重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对新质生产力由技术向产业转化机制缺乏系统性分析，对多维要素互动关系亦缺乏理论整合。因此，构建能够系统分析新质生产力内涵与实现路径的理论框架，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的重要任务。

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不仅为高风险创新活动提供资本支持，更通过金融创新（绿色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等）将资本逐利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等内在矛盾转化为价格信号和风险约束，触发“要素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生产方式根本性变革”的链式反应，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当代中国金融创新实践使金融不再仅是“加速器”式的中性工具，而是演化为兼具公共目标约束与创新引导功能的配置系统。

（二）研究假设

1.金融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直接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与资本周转速度，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支撑。从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出发，生息资本流入生产性部门能够推动产业扩张、技术进步与工艺改良，提升劳动生产率，即实现马克思所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推动生产要素量变扩张与生产规模扩大；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则强调资源聚集、风险分担与跨时空配置，使金融体系能够满足创新领域长期资金需求。实证研究亦显示，金融深化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19]。在现代金融发展背景下，虚拟资本并非必然脱离实体经济。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发展，未直接流入传统生产性部门的虚拟资本，可被合理引导回流至具备高成长潜力的产业，突破了传统金融理论对虚拟资本脱实向虚的简单批判。金融发展通过其基本功能与创新工具，促使生产力在传统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实现量变，进而通过支持多维度高质量创新实现质变。这种质变体现为高质量要素融合，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与提升的关键。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1：金融发展

能够显著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

2.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其核心不在于传统效率提升，而在于关键技术突破所引发的生产方式整体跃升[20]。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看，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而是通过为生产性资本提供资金，推动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现代经济体系中，这种质变飞跃的核心在于多维度高质量创新，融合了知识、科技和智能化等要素。西方金融功能观进一步说明了金融在创新中的必要性：金融体系通过跨时空配置与信息传递，将社会资本有效引向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创新领域。在此过程中，数字金融与科技金融依托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实现精准资源配置，打破了资金短缺与创新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21-22]，将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本有效对接。金融体系通过支持关键技术突破与创新扩散，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决定性支撑。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2：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产出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

3.金融发展、绿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其以高技术、高效能和生态价值取向为内核，强调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清洁化与可持续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传统资本的逐利性往往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退化；而现代金融作为推动生息资本集中与配置的重要机制，可引导资金在“创造性破坏”中实现“创造性转型”，推动资源从高消耗产业向绿色智能产业“有序撤退”[23]。金融发展使环境风险与成本逐步嵌入融资与投资决策，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创新工具，进行差异化定价与风险约束，将生态价值纳入资本循环的配置逻辑。例如，绿色金融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工具，引导资本进入清洁能源与环保低碳产业，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转型[24-25]。这为绿色技术提供了稳定资金支持与风险缓释渠道，促进企业在追求收益的同时提升环境绩效，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由此可见，金融发展通过优化资本流向、内化环境约束并支持绿色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关键支撑。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3：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绿色发展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

4.金融发展、公平发展与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统筹效率与公平，其形成不仅依赖技术和资本的投入，更取决于社会资源能否在更大范围内平等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金融体系往往加剧财富集中，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愈加突出。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通过制度性创新实现了从“资本集中”向“资本普惠”的转化。新质生产力能够在“新—质—生产力”三个层面以“富裕”与“共同”为抓手，为以公平发展为导向的分配格局奠定基础[26]。金融发展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包容性信贷等机制，依托数据要素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扩大金融服务对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覆盖范围[27]。这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进入门槛，激发了沉淀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的活力，同时改善了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了教育与创业机会的可及性。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公平与包容性增长，在制度层面推动了生产力结构性优化与质的跃升，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增长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公平发展，不仅在分配层面实现了“增长—公平”关系的协调，更在制度层面推动了生产力的结构性优化与质的跃升。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4：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公平发展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

四、实证设计

（一）模型设计

1.基准模型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基于时间—省份双向固定效应构建以下模型：

$$NFP_{it}=\alpha_0+\alpha_1 FD_{it}+\alpha_2 X_{it}+\mu_i+\phi_t+\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i为省份，t为年份，NFP_{it}为新质生产力；FD_{it}为金融发展水平；X_{it}为控制变量；μ_i为省份固定效

应；ϕ_t为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误差项。

2.中介效应模型

借鉴江艇[28]的做法，构建以下中介模型：

$$M_{it}=\alpha_0+\alpha_1 FD_{it}+\alpha_2 X_{it}+\mu_i+\phi_t+\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M_{it}为中介变量。

（二）变量、指标与数据

1.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水平（*NFP*）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可从“新”与“质”两方面理解：“新”体现为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引发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革，“质”体现为创新驱动下生产效率、结构和方式的全面变革[5]。基于此，本文参考韩文龙等[12]的做法，构建涵盖实体性要素与渗透性要素的多维度评价体系，具体包括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新劳动对象、生产组织与新技术等关键要素。为客观衡量各指标重要性，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以减少主观赋权带来的偏差。

新质生产力形成依赖多维度要素协同提升。其核心包括：掌握高新技术、具备创新能力的新劳动者，是推动经济由粗放式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以自动化、信息化和高技术产业建设为代表的新劳动资料，为生产效率提升提供物质基础；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劳动对象，体现能源结构升级与新材料技术进步在生产力跃升中的作用；以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为特征的现代生产组织，推动生产方式逐步向高效、低碳与智能方向演进；以研发投入与技术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新技术创新体系，是生产力质变的直接动力来源。通过上述要素综合构建与协同互动，本文形成多维度新质生产力评价体系，用以全面衡量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见表1。

表1 新质生产力评价体系

维度	构成要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属性
实体性要素	新劳动者	新劳动者数量	高新技术类从业人员	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数量	+
		新劳动者结构	高新技术类高等学历人员占比	高新技术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占比	+
			高新技术类科技活动人员占比	高新技术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占比	+
	新劳动资料	新生产工具	自动化水平	使用“Bartik工具变量法”构建省级层面的工业机器人密度	+
			信息化进程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的总数	+
			技术产业规模	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总量	+
		新基础设施	高新科技产业建设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
	新劳动对象	新能源	清洁能源渗透程度	新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	+
		新材料	新材料行业发展	规模以上新材料行业公司数量	+
渗透性要素	生产组织	数字智能化	数字经济创新	数字经济领域的专利数量	+
			人工智能发展	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数量	+
			电子商务活跃度	电子商务平台上交易的总金额	+
			企业数字化转型	采用信息化管理的企业总数	+
		绿色化	绿色创新	绿色领域的发明专利总数	+
			环境治理	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实际投资额	+
	新技术	技术研发	研发人员配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	+
			研发资金投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	+
			研发机构规模	研发机构的总数量	+
			技术成果市场化	技术市场中技术交易总金额	+
		创新产出	技术创新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
			区域创新能力	衡量区域创新能力－IRIEC指数	+
			创新成果转化率	新技术和新产品销售的总收入	+

2.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并取对数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D*)。金融发展综合指标(*FDC*)参考熊学萍等[29]的做法，同时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综合得分。本文同时选取*FD*与*FDC*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一方面，保留经典指标以便与既有文献对照并突出其基础性意义；另一方面，引入综合指标以更全面反映金融体系的多维发展特征，通过双重口径检验确保实证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3. 控制变量(*X*)

控制变量选取科技支出强度(*TES*)、市场化程度(*MKT*)、教育支出强度(*EES*)和对外开放程度(*DOO*)，分别以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GDP比值、市场化指数、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值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值衡量。

4.金融发展多维度变量(*F*)

选取金融发展的绿色金融(*GRF*)、数字普惠金融(*DIF*)与科技金融(*STF*)3个维度。绿色金融评价体系参考曾学文等[30]的构建方法，科技金融评价体系参考徐宇明等[31]的做法。二者均通过熵权法处理形成综合指数。数字普惠金融在理论上被视为“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统一逻辑链：前者通过数据与算法降低信息与交易成本，后者通过制度安排扩大覆盖面。为保持理论与计量口径一致，实证部分统一采用北京大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度，以下简称“数字普惠金融”。

5. 中介变量(*M*)

技术创新(*TI*)以区域专利申请授权量衡量。绿色发展(*GRE*)以绿色发明专利数量衡量。公平发展(*EQY*)以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衡量。

6.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与样本质量，本文选取2008—2022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IRIEC)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所有变量数据均为省级层面数据。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来源
新质生产力水平	*NFP*	根据评价体系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指标	0.114	0.099	0.006	0.765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经典金融发展水平	*FD*	ln(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GDP)	1.378	0.342	0.400	2.149	国家统计局
金融发展综合指标	*FDC*	金融发展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0.203	0.115	0.054	0.800	国家统计局
科技支出强度	*TES*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GDP	0.005	0.003	0.002	0.014	国家统计局
市场化水平	*MKT*	市场化指数	7.782	2.044	3.058	16.738	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
对外开放水平	*DOO*	货物进出口总额/GDP	0.421	0.475	0.011	2.444	国家统计局
教育支出强度	*EES*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GDP	0.040	0.014	0.019	0.112	国家统计局
技术创新	*TI*	区域专利申请授权量	0.644	1.151	0.002	10.347	国家统计局
数字普惠金融	*DIF*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195.230	137.010	0	460.690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绿色金融	*GRF*	绿色金融指标评价体系	0.132	0.090	0.020	0.603	国家统计局
科技金融	*STF*	科技金融指标评价体系	0.121	0.105	0.019	0.722	国家统计局
公平发展	*EQY*	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	1.050	0.490	0.410	2.770	国家统计局
绿色发展	*GRE*	绿色发明专利数量	766.210	1 364.490	0	9 564.000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三)基准回归结果

金融发展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回归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第(1)列中,*FDC*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第(2)(3)列中,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或固定效应,系数均稳健显著,验证了假说H1。第(4)列采用经典金融发展代理指标进行回归,其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无论指标口径如何变化,金融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结论一致成立。

科技支出强度在各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科技支出的增加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与技术创新核心地位相吻合。市场化程度亦显著为正,说明更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推动要素流动和创新资源配置。相比之下,教育支出未呈现显著影响,可能与其对生产力作用具有滞后性或受区域结构差异干扰有关。对外开放程度虽为负系数,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表3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1)*NFP*	(2)*NFP*	(3)*NFP*	(4)*NFP*
FDC	0.660***	0.584***	0.682***	
	(3.336)	(9.392)	(4.275)	
FD				0.040**
				(2.165)
TES		7.981**	10.563**	10.086**
		(1.960)	(2.348)	(2.105)
MKT		0.018***	0.014***	0.015**
		(2.890)	(2.974)	(2.652)
EES		−0.074	1.291	1.421
		(−0.186)	(1.036)	(1.065)
DOO		−0.015	−0.019	−0.027
		(−1.224)	(−1.042)	(−1.331)
个体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观测值数	450	450	450	450
Within R^2	0.667	0.689	0.750	0.716

注:1.()内为*t*值。

2.**和***分别表示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

(四)机制检验结果

表4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假说H2得到验证。第(2)列金融发展对绿色转型的系数亦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支持绿色产业与环境友好型技术,推动绿色转型进程,假说H3得到验证。第(3)列金融发展对公平发展的影响显著为负,意味着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提升经济的包容性,假说H4得到验证。

表4 机制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1)*TI*	(2)*GRE*	(3)*EQY*
FDC	8.210**	2.035***	−2.132*
	(2.582)	(4.561)	(−1.788)
观测值数	450	450	450
Within R^2	0.571	0.644	0.340

注:1.()内为*t*值。

2.*、**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

3.已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五)稳健性检验结果①

本文进行了两种稳健性检验。第一,子样本回归。由于直辖市的特殊性,采取剔除4个直辖市后的

① 篇幅限制,结果留存备索。

子样本进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剔除直辖市后，金融发展综合指标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第二，更换新质生产力测度方法。在本文评价体系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总量、绿化覆盖率、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传统生产力要素指标。结果表明，更换新质生产力测度方法后，经典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综合指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五、进一步分析：金融多维度效应检验

现代金融体系已超越传统资源配置功能，日益成为具有结构引导与公共目标约束的制度性力量。其内涵不仅体现为资本规模扩张，更关键的是通过制度工具创新推动发展方式变革。绿色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分别在生态转型、包容性提升和技术创新等关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多维动力。为进一步印证前文“资本矛盾—金融创新—新质生产力”理论链条，本文开展金融多维度回归：分别以绿色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其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见表5。

表5　金融多维度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1)*NFP*	(2)*NFP*	(3)*NFP*
GRF	0.146* (1.799)		
DIF		0.002*** (4.471)	
STF			0.644*** (3.140)
观测值数	450	450	450
Within R^2	0.717	0.778	0.838

注：1.（）内为*t*值。

2. *和***分别表示在10%和1%的水平下显著。

3. 已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第(1)列中*GRF*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绿色金融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第(2)列中*DIF*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化与普惠化并进能扩大金融供给、改善资源匹配，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第(3)列中*STF*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反映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对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鉴于各指标量纲不同，本文以显著性和符号为主要判断依据。

将以上发现与本文马克思主义金融视角对照，可以清晰看到“资本矛盾—金融创新—新质生产力”理论链条在数据层面的对应：绿色金融通过将环境成本纳入融资定价，实现对“增长—生态”矛盾的制度化治理；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扩大金融覆盖面，弱化“资本集中—排斥”局限性；科技金融则以长期资本与风险分担机制缓解“高不确定性—短期融资不匹配”矛盾，从而推动技术创新扩散与落地。结合前文基准回归结果，本文的结论在分维度检验下依旧成立并更具解释力：金融并非仅是中性“量的加速器”，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形成具有公共目标约束与结构引导能力的配置机制，其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由外生“资金供给效应”深化为内生“结构重塑效应”。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作为国民经济血脉，金融对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出发点，关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金融发展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在理论分析上，本文将资本循环与生息资本逻辑同当代中国金融发展多维度创新相结合，围绕新质生产力新命题，探讨金融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突破了传统研究仅关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2008—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探究金融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有三点。第一，金融发展显著提升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子样本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表明，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金融发展不再仅仅通过扩大资本规模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改善要素流动效率，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持续制度支撑。第二，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绿色发展以及公平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这表明，新质生产力并非单纯依赖技术创新，而是以高质量创新为核心，在绿色转型与包容性发展等维度实现协同跃升，进而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更加可持续稳定的制度基础。第三，绿色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类型金融创新工具均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绿色金融通过引导资本流向绿色

低碳领域，推动生产方式转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服务门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科技金融则通过强化对创新活动的金融支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这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金融创新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制度支撑。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优化金融支持创新多维机制，促进高质量创新。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和优化资源配置，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因此，应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能力，尤其是面向高风险、高潜力创新领域。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多样化创新金融工具，如科技信贷、技术保险、风险投资基金等，为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但金融机构在为创新型企业提供资金时，仍存在判断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识别高风险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方面。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金融机构，受制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绩效考核要求，更倾向于采取保守投资策略，对高风险新兴产业融资意愿不足，即使企业具备创新潜力，若缺乏明确业绩保障或成熟商业模型，也难以获得信贷支持。为提升金融机构对创新产业支持能力，建议加强对技术创新认知和评估能力，建立专门创新评估部门，培养能够有效判断新兴技术和产业潜力的金融人才。此外，政府应推动金融机构与科研院所、高校合作，提升其对创新领域的认知，支持前沿技术发展。

其次，完善金融促进公平发展制度安排，夯实新质生产力形成社会基础。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不仅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提升，还通过改善公平发展状况发挥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形成依赖包容的制度环境与均衡要素参与机制。然而在现实中，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仍普遍面临融资成本偏高、信用信息缺失等约束，这种结构性金融排斥抑制了潜在创新主体进入。针对上述问题，政策层面应围绕金融供给结构优化、风险分担机制完善与公共数据治理协同发力：一方面，引导商业银行优化面向中小企业和区域创新主体信贷结构，通过差异化风险权重、批量化小额信贷产品等方式，缓解金融机构因风险偏好和考核约束而形成“选择性供给”问题；另一方面，进一步健全财政与金融协同风险共担机制，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兜底功能，降低金融机构参与普惠领域预期损失，避免因单点违约引发整体退出。同时，应加快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标准化建设，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政务、产业与金融数据联通，降低信息不对称对普惠金融扩展制度性阻碍，进而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加稳固而包容的社会制度基础。

最后，构建“绿色—数字普惠—科技”协同的金融供给体系，放大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结构性促进作用。基于本文实证结果，绿色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均对新质生产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政策层面应由“单一抓手”转向“三维协同”。在绿色金融方面，应加快统一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将能耗排放纳入信贷定价，健全绿色项目库与第三方评估体系，常态化发展绿色信贷，形成低成本、长期化绿色资本供给。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应重点依托现有政务数据平台，整合税务、社保、公用事业等跨部门信息，建设区域中小微企业信用库，推动大数据风控产品创新，提高普惠金融可得性与精准度。在科技金融方面，应鼓励保险资金、政府引导基金等长期资本更多投向硬科技领域，支持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深化“投贷联动”实践，健全知识产权质押估值、交易机制，推动科创板成为科技企业融资主阵地，缓解科技创新中长期资本需求与高风险不匹配问题。同时建立涵盖绿色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和科技金融的绩效考核体系，将其与专项债额度和财政奖补挂钩，形成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持续优化结构性供给激励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 Schumpeter J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M].2nd ed. New York:Harper,1947:81-86.

[2]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S71-S102.

[3] Arcand J L, Berkes E, Panizza U. Too much fina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5,20(2):105-148.

[4] 文书洋，刘锡良，董青马.金融业应当让利吗：基本事实，理论分析与全球实证证据[J].金融研究，2023,66(5):20-37.
Wen S Y, Liu X L, Dong Q M. Should the financial sector “subsidize” the real sector: facts, theory, and global evide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2023,66(5):20-37.

[5] 潘建屯，陶泓伶.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三重维度[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4(4):12-19.
Pan J T, Tao H L.Understanding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24,44(4):12-19.

[6] 朱富显,李瑞雪,徐晓莉,等.中国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J].工业技术经济,2024,43(3):44-53.
Zhu F X, Li R X, Xu X L, et al. Construction 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new productivity indicators of China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Economy,2024,43(3):44-53.

[7] 李燕凌,蔡湘杰.科技金融促进了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吗?[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45(6):10-18.
Li Y L, Cai X J. Do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J].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24,45(6):10-18.

[8] 朱波,曾丽丹.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财经科学,2024,68(8):16-31.
Zhu B, Zeng L D. Analysis of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development on region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J]. Finance & Economics,2024,68(8):16-31.

[9] Passarella M V. A Marx "crises" model: the reproduction schemes revisited[R].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Study Group Working Paper,2016.

[10] 钟雨培,王峰明.资本主义信用危机的成因及其传导机制探析[J].当代经济研究,2020,31(11):5-14.
Zhong Y P, Wang F M.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capitalist credit crisis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2020,31(11):5-14.

[11] 杨万平,黄若滢.新质生产力驱动下中国地区经济追赶空间缩减的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5):52-66.
Yang W P, Huang R Y.A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catch-up space reduction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Modern Economic Science,2025,47(5):52-66.

[12] 韩文龙,张瑞生,赵峰.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6):5-25.
Han W L, Zhang R S, Zhao F. The measur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new driving forc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2024,41(6):5-25.

[13]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14(6):127-145.
Gao F. The logic,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 and current significa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J]. China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23,14(6):127-145.

[14] 王遥,李雨珊,吴祯姝.可持续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6):1-15.
Wang Y, Li Y S, Wu Z S.A theoretical mechanism study on sustainable finance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Modern Economic Science,2025,47(6):1-15.

[15]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78-85.

[16] Goldsmith R W.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572-580.

[17] 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81-121.

[18] Sweezy P M.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275-277.

[19] 李青原,赵奇伟,李江冰,等.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0,53(3):80-97.
Li Q Y, Zhao Q W, Li J B, et al. The study of FDI,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local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2010,53(3):80-97.

[20] 王树斌,侯博文,李彦昭.新质生产力要素机制、创新逻辑与路径突破:基于系统论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1):120-133.
Wang S B, Hou B W, Li Y Z.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ces element mechanism, innovation logic, and path breakthrough-through the lens of system theory[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2025,47(1):120-133.

[21] 汪淑娟,谷慎.科技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经济学家,2021,33(2):81-91.
Wang S J, Gu 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T finance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J]. The Economist,2021,33(2):81-91.

[22] 吴红艳,张晓骏,徐良培,等.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J].统计与决策,2023,39(21):144-148.
Wu H Y, Zhang X J, Xu L P, et al. Digital fin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J]. Statistics & Decision,2023,39(21):144-148.

[23] 方敏，杨虎涛.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形成发展[J].经济研究，2024，59(3)：20-28.
Fang M，Yang H 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24，59(3)：20-28.
[24] 文书洋，刘浩，王慧.绿色金融、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金融研究，2022，65(8)：1-17.
Wen S Y，Liu H，Wang H. Green finance，green innovation，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2022，65(8)：1-17.
[25] 张建鹏，陈诗一.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经济绿色转型[J].财经研究，2021，47(11)：78-93.
Zhang J P，Chen S Y. Financial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green economic transition[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21，47(11)：78-93.
[26] 王江.新质生产力、双循环联动与共同富裕[J].华东经济管理，2025，39(1)：10-20.
Wang J.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dual circulation linkage，and common prosperity[J].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2025，39(1)：10-20.
[27] 邹新阳，岳慧诗，李伶俐.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J].金融论坛，2023，28(1)：30-39.
Zou X Y，Yue H S，Li L L.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based on industrial[J]. Finance Forum，2023，28(1)：30-39.
[28]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40(5)：100-120.
Jiang T. Mediating effects and moderating effects in causal inference[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2022，40(5)：100-120.
[29] 熊学萍，谭霖.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比较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2004—2013)[J].经济与管理，2016，30(5)：72-78.
Xiong X P，Tan L. The 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4 to 2013[J]. Economy and Management，2016，30(5)：72-78.
[30] 曾学文，刘永强，满明俊，等.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程度的测度分析[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7(6)：112-121.
Zeng X W，Liu Y Q，Man M J，et al.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green finance[J]. 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2014，7(6)：112-121.
[31] 徐宇明，熊琦哲，蒋筠.科技金融发展指数的测度及其相关特征分析[J].金融与经济，2020，41(12)：42-48.
Xu Y M，Xiong Q Z，Jiang Y. Measuremen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development index and analysis of its related characteristics[J]. Finance and Economy，2020，41(12)：42-48.

[本刊相关文献]

[1] 李健，张金林，吴霖，等.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企业研发信息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26，48(1)：90-104.
[2] 王遥，李雨珊，吴祯姝.可持续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6)：1-15.
[3] 杨万平，黄若滢.新质生产力驱动下中国地区经济追赶空间缩减的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5)：52-66.
[4] 王文，孙迎雪.智能制造与新质生产力：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5)：34-51.
[5] 苏振东，官硕，李卓平.新质生产力：创新力与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3)：96-114.
[6] 盖凯程，晏晨景，刘璐.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差异、动态演变与影响因素：基于生产关系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2)：1-18.
[7] 王树斌，侯博文，李彦昭.新质生产力要素机制、创新逻辑与路径突破：基于系统论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25，47(1)：120-133.
[8] 王国成，程振锋.新质生产力与基本经济模态转换[J].当代经济科学，2024，46(3)：71-79.

编辑：张静，王磊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Financial Theory

WEN Shuyang[1,2], WANG Chenyu[1], WU Ke[2]

1. Institute of Chinese Finance Studie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Beijing 100038, China

Summary As China's economy enters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chieving a qualitative leap from factor-driven growth to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as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driving this leap, involve frontier technologies with high risks and long development cycles, as well as significant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green transformation. These features pose fundamental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system, which often suffers from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such as maturity mismatches 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Marxist financial theory to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corresponding transmission pathway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study builds upon Marx's theories of interest-bearing capital and capital circulation, while critically incorporating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from Western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y.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apital contradictions-financial innovation-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framework reveals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finance resolves the intrinsic contradictions of the profit-seeking logic of capital and promotes the qualitative upgrading of productive forces via institutionalized innovation. At the empirical level, drawing on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encompassing new laborers, new means of labor, new objects of labor, new forms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provincial-level index of NQPF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Using panel data from 30 Chinese provinces over the period 2008—2022, the study employs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NQPF. Furthermore, mediation effect models and dimension-specific regression analyses are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to assess the roles of different form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yield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robust positive effect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result remains stable after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Second,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does not operate solely through capital accumulation. Instead, it enhan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including the promo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advance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distributional fairnes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NQPF are not generated by isolat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lone, but by coordinated improvements in innovation quality,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ird,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green financ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sci-tech finance—representing key forms of contemporary financial innovation—each exer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reen finance facilitate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sts and directs capital toward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activiti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educes transaction thresholds by leveraging dat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sci-tech finance improves the matching of sci-tech innovation risks.

This study makes several main contributions. First, it introduc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hasizing its key institutional role in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supporting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driving innovation, thereby complementing existing studies that predominantly focus on technological or industrial perspectives while neglec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econd, by proposing and empirically validating the systematic causal chain of "capital contradictions-financial innovation-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green finance and other financial innovations into a unified political economy framework, and constructs a composite index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doing so, it reveal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through which finance promotes the leap of productive forces from quantitative expansion to qualitative upgrading. Third, building on Marx's theories of interest-bearing capital and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inancial practic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novel proposition of "finance as a catalyst for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It argues that, unde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finance can transform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logic into institutionalized and governable rules through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reby expanding the explanatory scope of Marxist financial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arxist financial theo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development; equitable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novation